



中国国际关系学会博士论坛系列

ZHONGGUO GUOJI GUANXI XUEHUI BOSHI LUNTAN XILIE

国际关系研究

合作理论及争鸣

2008年博士论坛

中国国际关系学会 编



世界知识出版社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Contending Theories of Cooperation Ph.D. Candidates Forum 2008

国际关系研究：合作理论及争鸣

——2008 年博士论坛

中国国际关系学会 编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国际关系研究：合作理论及争鸣：2008年博士论坛 / 中国国际关系学会编. —北京：世界知识出版社，2009. 5

ISBN 978-7-5012-3305-2

I. 国… II. 中… III. 国际合作—学术会议—文集

IV. D812-53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09）第057583号

责任编辑

袁路明 罗养毅

责任出版

赵 玥

责任校对

戴文达

封面设计

徐威明 小 月

书 名

国际关系研究：合作理论及争鸣
——2008年博士论坛

Guoji Guanxi Yanjiu: Hezuo Lilun ji Zhengming——2008Nian Boshi Luntan

作 者

中国国际关系学会 编

出版发行

世界知识出版社

地址邮编

北京市东城区干面胡同51号（100010）

网 址

www.wap1934.com

印 刷

北京京晟纪元印刷有限公司

经 销

新华书店

开本印张

787×1092毫米 1/16 18印张

字 数

330千字

版次印次

2009年5月第一版 2009年5月第一次印刷

标准书号

ISBN 978-7-5012-3305-2

定 价

36.00元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作者简介

撰稿人（按发言顺序排列）

- 胡 波 北京大学国际关系学院博士生
吴文兵 清华大学国际问题研究所博士生
汤 蓓 复旦大学国际关系与公共事务学院博士生
徐 婷 上海外国语大学国际关系与外交事务研究院博士生
王 玮 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经济与政治系博士生
徐秀军 华中师范大学政治学研究院博士生
阮金之 暨南大学东南亚研究所博士生
石贤泽 中国人民大学国际关系学院博士生
张雪鹏 云南大学国际关系研究院博士生
姜照辉 山东大学政治学院博士生
林民旺 外交学院国际关系研究所博士生
王 超 南京国际关系学院国际战略研究中心博士生
宣兴章 中共中央党校国际战略研究所博士生
王新龙 上海交通大学国际与公共事务学院博士生
马 珂 华东师范大学人文学院博士生

评论人（按姓氏笔画排列）

- 门洪华 中共中央党校国际战略研究所，教授
方长平 中国人民大学国际关系学院院长助理，教授
王逸舟 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经济与政治研究所副所长，研究员，博士生导师
王正毅 北京大学国际关系学院国际政治经济系主任，教授，博士生导师
王存刚 天津师范大学政治与行政学院政治学系副主任，教授
冯绍雷 华东师范大学地区与国际关系研究院院长，教授，博士生导师
朱立群 外交学院院长助理，教授，博士生导师

- 任 晓 复旦大学国际问题研究院副院长，教授
- 李少军 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经济与政治研究所国际政治室主任，研究员，博士生导师
- 李 滨 南京大学公共管理学院政治系，教授
- 苏长和 上海外国语大学国际关系与外交事务研究院院长，教授
- 肖欢容 中国传媒大学国际关系学系主任，教授
- 陈志敏 复旦大学国际关系与公共事务学院国际政治系主任，教授，博士生导师
- 张睿壮 南开大学国际问题研究院院长，教授，博士生导师
- 俞正樑 上海交通大学国际与公共事务学院教授，中国国际关系学会副会长，博士生导师
- 秦亚青 外交学院常务副院长兼党委书记，教授，博士生导师
- 郭树勇 上海交通大学国际与公共事务学院副院长，教授，博士生导师

学习 感悟 创新

——在第三届中国国际关系学会博士论坛上的致辞

秦亚青

今年是中国国际关系学会举办的第三届博士论坛。每年的论坛我们都是与高校联合主办的，第一届在外交学院，第二届在南开大学，今年在上海交通大学。首先我代表中国国际关系学会向交通大学表示衷心的感谢。我们置身这所具有悠久学统的高校，举办2008年度的博士论坛，深感学术的责任、学术的厚重、学术的尊严。

在历年的博士论坛上，我都想利用这一平台，提倡一种精神。记得第一届强调的是交流精神，是学术思想的平等交流和相互冲撞；第二届倡导的是敬畏学问，是以敬畏的心态去热爱学问、潜心学问、砥砺学问，将学问作为自己的事业和追求。这几天一直在想，今年应该说一点什么呢？

王逸舟教授今年承担了一个重大项目，总结改革开放30年中国国际关系的发展历程。其中中国国际关系理论部分由我承担。这给了我一个极好的学习机会，得以将这30年来国际关系理论研究的文献一一回顾。我在翻阅1124篇涉及国际关系理论论文的时候，一方面为中国国际关系学界取得的巨大成就感到欢欣鼓舞。改革开放确实给了中国国关学界新的活力和动力，中国国际关系研究的队伍和规模已经仅次于美国。另一方面，也为我们创新成果的匮乏感到愧疚不安，即便将创新的标准降到最低，30年来在理论研究方面有所创新的成果也不足5%。

因此，我想把今天的发言重点放在学术创新上面。

首先是要有创新的意思。质疑是学问的精神，是探索未知的领域，是知识的生产和再生产。当我

们面对一个重大的国际关系理论时，是全盘接受使用，还是挑战权威，发现问题，质疑理论。我们的观点或许值得商榷，我们的观察或许有失偏颇，我们的文章或许可以批判，但是质疑的精神是创新意识的灵魂。没有质疑，便没有创新。

创新需要学习。创新不是凭空的杜撰和编造。创新是在前人研究基础上的突破，所以，学习和借鉴是创新的基础和前提。我们这些年对国际上先进的国际关系理论做了大量的引进，并且引进几乎是与理论产生同步进行。这在世界上是少有的事情。这种引进，表现了我们学习的需求和愿望，表现了我们知识的期待和渴求。学习借鉴是一个永无止境的过程，学习世界先进的知识，学习其他领域的先进知识，学习同事同仁的先进知识。我们强调功底的厚重扎实，强调知识结构的系统稳固，但我们不能忘记，学习的目的是为了创新。

创新需要感悟。机械模仿式的学习大约是学习过程中一个不可逾越的阶段，但是停留徘徊在机械学习的阶段是没有出路的。我们学习的是知识，感悟的是思想中的精灵。当我们借用一个理论模式，然后照搬这个模式的框架去做我们的研究，结果最多是一篇中等水平的复制件。如果我们感悟到优秀学术成果中的灵气，其思想灵气、设计灵气、推理灵气，并通过感悟诱发出我们的灵气，那就为创新奠定了基础。

创新是学术的目的，是学问的最高境界。希望在我们国际关系学界更多地出现两种类型创新。一种是局部的突破性创新。我们已经引进了大量的前沿国际关系理论，也看到了一些优秀学者是怎样在原有理论框架中进行创新的。在现阶段，我们的博士生可能尤其需要以问题为导向，以细致的经验研究为工具，一步一个脚印地认认真真做研究，以实现至少局部或是一点上的创新。当然，我们还应该有更大的目标，那就是实现对现有国际关系研究主导框架的突破，这是更大意义上的创新，也决不是一朝一时之功。中国的理念、中国的经验、中国的实践都可以成为这种创新的源泉。

创新是艰难的。即便是一点点的创新都需要为伊消得人憔悴，但是为了中国的国际关系研究事业，为了人类知识的繁荣和发展，我们需要创新，我们年轻的博士生们尤其要将学术创新作为自己的奋斗目标。深化我们的学习、启迪我们的灵智，付出我们的汗水与心血，这一目标是一定能够实现的。这也是我们博士论坛的重要目的之一。

目

录

学习 感悟 创新 / 4

——在第三届中国国际关系学会博士论坛上的致辞
秦亚青

预期收益类型差异与国际合作 / 1

国际机制变迁的动因及其批判 / 21

国际卫生合作中的猎鹿困境与通报机制建设 / 33

自由制度主义国际合作理论的成就与不足——以国际气候
变化合作制度为例 / 48

国际制度对非成员国的作用 / 62

新自由制度主义的国际合作理论：文本解读与反思 / 81

国际制度的群体视角 / 100

国际关系学科史视域下的国际合作研究：一种单向度的
关联分析 / 115

利益、权力、机制和认同：国际反恐合作的多维分析 / 145

国际合作理论分析中国欧盟合作 / 157

国内观众成本与国际合作 / 173

当代中国身份定位的演变对其参与国际合作的影响 / 195

国际关系理论的古希腊根源：行动者、结构论述模式的
剧场假象 / 221

国际安全合作：一种安全哲学视角的解读 / 243

后民族主义集体认同的建构——争论及其启示 / 257

后 记 / 279

主持人：王逸舟

发言人：胡 波

点评人：张睿壮 门洪华

预期收益类型差异与国际合作^{*}

胡 波

一、预期收益分配结构在国际合作研究中的地位和研究现状

对于什么是国际合作，学术界已经有比较大的共识，一般都认同罗伯特·基欧汉对国际合作下的定义：“通过政策协调过程，当行为者将它们的行为调整到适应其他行为者现行的或可预料的偏好上时，合作就会出现。”换句话说就是：“作为政策协调过程的结果，当两国政府相互认识到对方政府遵从的政策能够促成他们各自的目标时，政府间的合作就会发生。”^①但，对于国际合作成败的原因，却是众说纷纭，至少存在以下七种不同角度的研究假设：一、绝对收益、相对收益和互惠影响国际合作；二、行为者的数目影响国际合作；三、未来的前景影响国际合作；四、国际制度与国际合作；五、认识共同体与国际合作；六、权力分布不平衡导致国际合作；七、国内政治影响国际合作。^②其中，绝对收益、相对收益和互惠，行为者的数目和未来的前景探讨的都是预期收益的分配问题，收益分配问题是国际合作能否进行的根本原因。

^{*} 本文根据笔者在第三届中国国际关系学会博士论坛的发言修改而成，感谢王逸舟、张睿壮、门洪华、王正毅等老师的宝贵意见，同时也感谢上海交通大学第三届中国国际关系学会博士论坛会务组提供的这次发言机会。当然，文中的疏漏和错误概由笔者自负。

① [美] 罗伯特·基欧汉：《霸权之后：世界政治经济中的合作与纷争》，苏长和、信强等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01年版，第62页。

② Helen Milner, "International Theories of Cooperation among Nations: Strengths and Weaknesses", *World Politics*, Vol.44, NO.3, Apr., 1992, 海伦·米尔纳在该文中总结了六类有关影响国际合作原因的研究，最后重点指出国内政治影响国际合作的研究比较薄弱，呼吁更多的学者从国内政治的角度去研究国际合作问题。

收益分配问题是国际合作研究的出发点。“国家利益是国际政治的动因”，毫无疑问，国家利益或者说预期的收益是国家参与或拒绝国际合作的最主要动机。一个国家在合作中必定支出了成本，那么它必然会有有一定的收益预期。如果合作不能带来利益，这种合作根本不可能发生。但是在国际实践中，行为者们经常在拥有重大共同预期收益的情况下却不能够合作。在国际制度、认同程度、权力分布和国内政治等影响因素都类似的情况下，国家有的时候能够合作，有的时候却不能合作。究竟什么样的预期收益分配结构能够促进合作？长期以来，研究者们通过对绝对收益与相对收益、参与者数目两个层面的研究，给出了大量大相径庭的解释。

（一）绝对收益和相对收益

收益分配问题首先是绝对值的问题，即为绝对收益。一般来说国家是自私的，国家总是尽可能的扩大自己的利益，而对其他国家的利益漠不关心。合作是普遍的，合作的障碍主要是欺骗和不信任，这些可以通过国际机制加以改善和解决。^①但收益分配结构中中的确存在相对值的问题，国家在关心扩大自己利益的同时，更关心其他人是否比自己获利更多（Waltz, 1959, 1979）。“国际社会的无政府状态给国家造成了很大的生存压力，国际社会不存在能够防止别国对自己使用武力侵略或奴役的超国家的力量”^②（Grieco, 1988）。因此国家对国际合作中的相对收益非常敏感，“国家在任何国际关系中的根本目的都是防止别国在相对实力上获得优势”。^③鲍维尔（R Powell）认为结构现实主义和新自由主义所描述的情况都属于特例，“国家到底是关注相对收益还是绝对收益，这个问题不取决于国家的偏好，而是取决于国家面临的环境或生存压力。”^④随着外部环境和限制条件的变化，国家有的时候将相对收益放在首位，有的时候优先关注绝对收益。当国家可以承受使用武力的代价时，对相对收益的关注就会上升，合作变得比较困难；反之，当武力不再成为国家间竞争的手段之时，对绝对

① Axelrod, Robert M (1984), *the Evolution of Cooperation* (New York : Basic Books, c1984).

② Joseph M. Grieco, "Anarchy and the Limits of Cooperation: A Realist Critique of the Newest Liberal Institutionalism", *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 Vol. 42, No. 3. Summer, 1988, pp.497-498.

③ Ibid, p.498.

④ Robert Powell, "Absolute and Relative Gains in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Theory", *The American Political Science Review*, Vol. 85, No. 4. Dec., 1991, p.1305.

收益的关注就会上升,合作就会相对容易。^①查尔斯·利普森则认为在不同的领域,国家对绝对收益和相对收益有不同的关注:在经济领域,国家主要关注的是绝对收益问题,因而合作容易展开,在军事安全领域,国家主要关注的是相对收益,所以合作比较困难。^②

(二) 行为者数目与国际合作

预期收益分配结构还与行为者数目有关。对于行为者数目影响分配结构的论述,同样存在截然不同的观点:肯尼思·奥伊认为国际合作的前景会随着参与者的增多而变得越来越黯淡。因为行为者数目越多,交易成本和沟通成本就会增加,欺骗和控制问题就会增多,同时,对背叛者的惩罚就会越困难。^③邓肯·斯奈德却认为相对收益阻碍国际合作的问题仅仅存在于两个国家的情况,随着参与国数目的增多,相对收益对国际合作的影响会最终消失。^④James S. Mosher提出,相对收益可以分为相对比例收益和相对绝对收益,国家数目的增多也有两种方式,一是新的国家进入国际体系,二是原有国家的合并与分裂。他批评斯奈德的观点是基于以下假设:1)有新的国家进入国际体系,2)国家关注的相对收益是绝对值的差异。^⑤而现实情况却是,国家关注的相对收益实际上是比例的变化而非收益绝对值的差别。现代国际社会中国家数目的减少或增多往往是通过合并或分裂而来的。因此国家数目的增多并不一定导致相对收益作用的下降。^⑥

二、现有研究存在的问题

这两个层次的研究使我们对收益是如何影响国际合作的过程有了基本

① Robert Powell, "Absolute and Relative Gains in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Theory", *The American Political Science Review*, Vol. 85, No. 4, Dec., 1991, p.1316.

② Charles Lipson, "International Cooperation in Economic and Security Affairs," *World Politics*, Vol.37, No.1, October 1984, p.23.

③ Kenneth A. Oye, "Explaining Cooperation under Anarchy: Hypotheses and Strategies", *Cooperation under Anarchy*, edited by Kenneth A. Oye, pp.18-19.

④ Duncan Snidal, "International Cooperation among Relative Gains Maximizers", *International Studies Quarterly*, Vol. 35, No. 4, Dec., 1991, pp.387-402.

⑤ James S. Mosher, "Relative Gains Concerns When the Number of States in the International System Increases", *The Journal of Conflict Resolution*, Vol. 47, No. 5, Oct., 2003, p.647.

⑥ Ibid, p.667.

的了解，同时也使我们对各个影响因素在国际合作中的作用有了比较清晰的认识。但是这些理论和假设也存在着一些问题：首先是过于武断，正如海伦·米尔纳所言，“在国际政治中，任何有关国家绝对优先关注相对收益或绝对收益的论述都是值得怀疑的。”^①任何国家都是既关注绝对收益，又关注相对收益的。在现实中，国家有的时候更关注绝对收益，有的时候更关注相对收益。与研究绝对收益和相对收益与国际合作的关系一样，行为者数目的大小与国际合作的关系同样很难说得清楚，实际上，行为者的数目与国际合作的关系是非常复杂的。他们之间的逻辑联系还未得到很好的理解和认识，更未得到真正的检验。^②其次，这些研究的结论大多很难证实或证伪，基欧汉认为收益分配必须平衡，因为如果不平衡，将导致行为者误判，制造对立而非合作。^③格里埃科提出，只有预期的收益在行为者之间平衡分布的时候，合作才有可能发生。但是“什么样的收益结构才是平衡的、互惠的分布（exchange）；这种平衡、互惠的分配（exchange）又在何时发生？”^④他们并未给出有说服力的答案。这些问题直接影响了这些理论的解释力和解释范围。造成这种状况的一大原因就在于研究者们经常会忽视预期收益类型在收益分配中的作用，另外，缺乏整体性也是导致研究不能深入的一个很重要的原因。他们很少将收益分配问题当做一个整体来看待，总是从收益多寡的层次去单独研究绝对收益和相对收益，从参与收益分配的行为者多少的层次去研究行为者数目与国际合作的关系。

如果我们将整个收益分配结构当作一个整体，它实际上是由分配比例、参与分配者的数量和收益分配的类型三个层次组合而成。而且，收益分配问题首先面临的既不是将一个蛋糕做大的问题，也不是有多少人参与分配的问题，而是能否有多种类型的蛋糕同时满足不同行为者的不同偏好。换句话说，收益分配问题首先要处理的是收益分配类型的问题，其次是参与分配行为者数目多寡的问题，最后才是收益分配多寡的计算。因为，如果

① James S. Mosher, "Relative Gains Concerns When the Number of States in the International System Increases", *The Journal of Conflict Resolution*, Vol. 47, No. 5, Oct., 2003, p.486

② Helen Milner, "International Theories of Cooperation among Nations: Strengths and Weaknesses", *World Politics*, Vol.44, No.3, Apr., 1992, p.474.

③ Robert O. Keohane, "Reciprocity in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 Vol. 40, No. 1 Winter, 1986, p. 27.

④ Helen Milner, "Review: International Theories of Cooperation among Nations: Strengths and Weaknesses", *World Politics*, Vol.44, No.3, Apr., 1992, pp.472-473.

不考虑收益类型，一切有关收益大小的计算将是混沌不清的。军事安全方面的收益和经济方面的收益是很难比较多寡的。更重要的是，合作谈判博弈过程中必须照顾到不同国家的不同类型偏好。同样类型的收益，对于不同的行为者的意义则是显然不同的。然而，研究者们长期将目光聚焦在后两个层次上，究竟国家在国际合作中关注的是绝对收益还是相对收益？究竟参与的国家多容易合作，还是参与的国家少容易合作？研究者们往往莫衷一是。我们的确很难一个个回答这些问题，因为我们只有通过收益分配问题进行全面整体的研究，才能最终回答什么样的预期收益分配结构会促进合作。因此，我们首先必须了解预期收益类型在预期收益分配结构的重要地位和其对其他两个层次的影响。

三、预期收益类型

预期收益类型指的是在国际合作中，参与各国对合作能够产生的收益种类的预期，各参与成员的预期收益类型分布即为预期收益类型结构。这个概念有两个前提，首先，预期收益类型必须具有一定的合理性，它必须在合作产生的最大边际效益的范围内，任何不切实际漫天要价的收益均不在本文探讨的预期收益类型的范围内。其次，预期收益类型如同整个收益分配结构一样，也是动态的。在讨价还价的博弈过程中，有可能会产生新的收益类型。在国际合作中，各行为者预期的收益种类会存在不同，这种类型的不同和收益绝对值、相对值还有分享收益的国家数目一起组成了预期的收益分配结构。

不同的国家，在不同类型的收益问题上，必然存在着不同的优先级别；在同一时间、同一空间的国际合作中，各行为体预期收益的类型必然存在着差异。国家之所以有这种收益类型偏好，首先是由行为体的先天禀赋的差异所决定的。世界上各个国家的领土面积和人口数量都相差很大，自然资源的分布非常不均匀；各国在历史发展中形成了风格各异的历史传统；同时世界各国的发展水平参差不齐；各国国内的政治运行机制也很不相同；世界各国的国家形态非常多样化，既有君主制国家、也有共和制国家，君主制国家又分为立宪君主制和君主立宪制。既有民主国家，也有集权国家，民主国家又分为总统制和议会制。加上各国的风土人情、国民性格、政治文化都有很大的差异。其次，各国面临的国际环境的不同也影响着他们关

注的收益类型。一国在国际社会中的权力位置，在国际制度中的影响力等构成了其面临的国际环境。不同的国际环境也导致了各国对收益类型的不同偏好。此外，偏好也是一个不断学习的过程：“偏好可能不是国家所固有的，可能并不局限于物质状况，相反，国家偏好具有伸展性。国家可能并不总是知道自己需要什么，也不容易被告知采取什么行动是合适的和有益的。”^① 合作产生的国家利益即为收益，根据收益的内容分类，一般可以将其分为政治收益、安全收益、经济收益和文化收益。不过由于这种分类没有凸显不同类收益对于国家的重要性层次，因此本文的分类不仅仅考虑到收益内容的不同，也照顾到各类收益的重要程度差异，综合两种分类方式，笔者将收益分为“生存、发展和荣辱”三大类。

（一）安全、生存

1. 保全社稷

对于任何一个国家而言，没有什么比国家生死存亡更重要的利益了。如果通过妥协、让步可以换来一个国家的生存，那么这个国家必会倾其所有去实现这种妥协和让步。国家会尽量“瓦全”，不到万不得已，绝不会“玉碎”。这是第一位的利益。

2. 政治独立及国际地位

一国的政府都希望拥有最高的国内和国际政治权力，都希望独立自主的进行国内外决策。但现实情况却是，大部分国家的政府并没有享受到主权赋予它们的所有权力。虽然理论上国家都拥有自己的主权，但实际上，由于国家地位的不平等，追求权力，提高国际地位永远是国家对外政策的一大重要诉求：“国际政治像一切政治一样，是追逐权力的斗争。”^②

3. 领土、势力范围

国家总是想方设法去扩大自己的领土或控制地盘，以使自己在国际社会中有更大的生存空间。从古到今，领土对于国家有着永恒的吸引力。世界地图的划定多半归功于战争，但也有相当大的功劳应该归功于合作，我们也可以称之为交易或买卖。如，拿破仑法国将路易斯安娜出售给美国、沙俄将阿拉斯加出售给美国。尤其到了近代，由于民族国家的出现，领土

① [美]玛莎·费丽莫：《国际社会中的国家利益》，袁正清译，浙江人民出版社2001年版，第13页。

② [美]汉斯·摩根索：《国家间政治——寻求权力与和平的斗争》，徐昕等译，中国人民公安大学1990年版，第35页。

问题变得极为敏感，在争议地区，各国政府都是寸土必争。如果在一次合作中，一国可以收获领土，它将有足够的动力去合作。

4. 平衡收益、霸权收益

一国要维持自己的生存和安全，一是靠自助，即通过壮大自身力量去应对别国的威胁；另一种方式就是靠结盟，即通过与别国结成盟友关系，以抵消其他国家相对于自己的战略优势。我们可以将结盟的收益称之为平衡收益。此外，大国一般都有谋求相对优势或者霸权的野心，无论这种优势是全球性质的，地区性质的，还是次地区性质的。我们都可以将其称之为“霸权收益”。

（二）经济、发展

1. 财富积累

如同扩大领土一样，国家也总是利用一切机会积累自己的经济财富。除了加快发展以外，国家可以通过与其他国家的贸易来积累财富。

2. 发展机会

世界舞台上的国家，其发展机会很大程度也取决于外部环境，国家通常采用各种措施改善自己面临的外部环境，从而获取更大的发展机会。各国之所以竞相加入WTO，也是为了谋求更大的发展机会。

3. 经济援助、馈赠

一国可以通过合作获取其他国家的经济援助或是馈赠。

（三）荣辱

1. 意识形态

主要是指关于某一社会制度或生活方式的一系列根本的政治、经济及社会的价值观念。是有关政治、道德和哲学等社会意识的文化。也可以被视为有关社会行动或政治实践的“思想体系”、“信仰体系”或“象征体系”。^① 美苏冷战的对峙很大程度上也是意识形态的较量。

2. 国际道义、盟国义务

在国际政治中，国际法和国际规则具有一定的权威性和约束力；其次，国家签署一些双边的或多边的协议，包括同盟协议；最后，国家也会对一

^① [英]约翰·B. 汤普森：《意识形态与现代文化》，高铤等译，译林出版社1996年版，第6页。

些事务做一些非正式的承诺。遵守这些规则、协议和承诺能提高国家的信誉。反之，则会是负面的影响。

3. 文化影响

一些历史悠久的国家还特别在意自己的文化在国际上的影响。如，法国不遗余力的在世界上推广法语；中国在国外建立孔子学院，传播中国传统文化。

4. 大国威望

在国际政治中，大国具有相对的权力优势。大国除了关注安全和发展收益之外，威望或威信也是其预期收益的重要组成部分。

需要说明的是，真实的国际关系实践中，预期收益的类型差异往往更多存在同一大领域内。换句话说，同领域内的收益类型差异远远比不同领域之间的收益类型差异要常见。因为国家间合作，总是围绕某一领域或某几个领域而展开的。如同样是经济领域的收益，在WTO谈判中，有的国家更关心农产品收益，有的更关心纺织品收益；同样是安全领域的收益，有的国家涉及的是生死存亡的收益，有的更关心霸权收益。

四、预期收益类型差异对于国际合作的意义

研究者们已经注意到增加议题会促进合作，因为，在单一问题上，两个国家有可能互相反对；但如果同时有多个议题，国家可能在不同议题上有不同的优先顺序，因而可以通过不同领域的利益交换来促进合作。^①因此，为了合作得以顺利进行，国家间通常采用利益捆绑来促进合作。如在古代外交中，和亲外交非常多见。弱小的国家为了获得强大国家对其的安全承诺，往往会牺牲皇室的公主和钱财；此外，还有“一揽子”协议的说法，这是WTO谈判的一个重要原则。因为即使在贸易领域，不同国家的情况也很不相同，有的农业比较发达、有的手工业比较发达，还有的汽车行业比较发达……不同行业对于各国的意义迥然不同。如果谈判是分开的，这几乎没有成功的可能，因为各国总是谋求自己利益的最大化，同时也关注谁得到的更多。但如果采用“一揽子”解决办法，一国在A行业的让步

^① Helen Milner, "International Theories of Cooperation among Nations: Strengths and Weaknesses", *World Politics*, Vol.44, No.3, Apr., 1992, p.485.

会换来其在B行业的得利，合作就容易得多，如果这个国家更关注在B行业中的收益，那么这种合作就更容易进行了。

预期收益类型在预期收益分配结构中占有重要的地位，预期收益类型差异通过影响预期收益分配的整体结构从而对国际合作产生重大影响。遗憾的是，学界长期的研究忽视了预期收益类型差异对收益分配结构和国际合作的影响。这也导致现有理论无法解释一系列的国际现象：为什么国家有的时候关注相对收益，有的时候关注绝对收益？为什么有着同样数目的参与国家，有的合作能够成功，有的合作却不能够成功？究竟国家数目的增多对国际合作的影响是什么？既然预期收益类型是预期收益分配结构的首要问题，那么它必然会对绝对收益与相对收益和参与国数目大小这两个层次产生作用，从而影响国际合作。由于预期收益类型的差异会降低相对收益的敏感性，差异大的时候，国家会优先关注绝对收益；差异小的时候，国家就会最关心各自的相对收益；在多边合作中，预期收益类型的存在，会促进国际分工，从而保证公共物品的供给。此外，既然存在不同的利益考虑，就有利益交换的需求，预期收益类型差异必然也会改善国际合作中的沟通和利益博弈的环境。

五、预期收益类型差异与国际合作

（一）预期收益类型差异降低了相对收益的敏感性

虽然人们对究竟绝对收益还是相对收益是国际合作中的主要考虑因素持不同看法，虽然即使在考虑相对收益的情况下，也并不缺乏合作成功的例子，但是，相对收益妨碍国际合作的前景却是不争的事实。一个蛋糕即使做得再大，依然会有分配不均的问题。在国际合作中，如果一个国家有多种收益，考虑到收益类型不同及偏好差异，这个国家的总收益可以简化为各类收益的权重和各类收益大小乘积的和，具体数学模型如下：

$$\sum (X) = K_{ax}AX + K_{bx}BX + K_{cx}CX \cdots \quad (1)$$

$$K_{ax} + K_{bx} + K_{cx} \cdots = 1 \quad (2)$$

其中， $\sum (X)$ 代表的是某个国家的预期的总收益； K_{ax} ， K_{bx} ， K_{cx} 代表的是这个国家在不同类收益上的权重，或者说偏好程度； AX BX CX